

【学界往事】

□丁东

每年10月到12月,是诺贝尔奖公布和颁奖的季节。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医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奖项,代表着世界科学研究的最高荣誉,历来争议较少,一个多世纪以来却与中国大陆科学家无缘,不免让国人感到失落。

我因为从事口述历史,与高锴先生有过一席谈。高先生曾经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多年,后来到全国人大从事立法工作,直到离休。他虽然已是耄耋之年,但思想活跃,十分健谈。他曾结合自己的家世和经历,和我漫谈这个话题。

高先生老家是上海金山县。祖父曾在光绪年间中学,不愿做官,办了两所学堂,除了讲授“四书五经”外,还教数学和外语,在当时相当先进。叔祖父高吹万是诗人,藏书十多万卷,其中孤本一千余种,非常珍贵,1949年后都捐献给了国家。1958年去世时,胡厥文挽曰:“南社早蜚声,金山一代英。笔摇清帝鼎,梦断岳王坟。革命心肠热,攘夷思想新。遗诗千百首,一读一酸辛。”高吹万1903年还和高锴的堂伯父高旭创办《党民》月刊,鼓吹民主革命,反对腐朽清廷,不惜冒杀头之罪,点名批判慈禧太后,在刊物上真名真姓,注出版社地址,真是英勇无畏!高旭因反清被通缉,逃亡日本,结识孙中山,参加同盟会,后秘密回国,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,1909年发起创立“南社”。南社第一任主任是柳亚子,第二任主任是他舅舅姚光。高家老一辈人几乎全是南社社员。南社是当时人数最多、影响最大的进步知识分子组织。高锴的伯父高平子是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开拓者,1986年,国际天文学会

【读史新解】

□王佐良

自古以来,成语“杞人忧天”的意思就是不必要的自寻烦恼,前些天看了央视《文化之旅》节目,讲到“杞人忧天”,专家的解说与习惯无异。翻开《辞海》,在“杞人忧天”条下有这样的话:《列子·天瑞》:“杞国有人,忧天地崩坠,身亡所寄,废寝食者。”后称不必要的或无根据的忧虑为“杞人忧天”。李白《梁甫吟》:“白日不照吾精诚,杞国无事忧天倾。”

可是,三千年前的杞人真的是无缘无故地“忧天”吗?“天”真的就这样澄清明朗、一目了然,无须忧虑吗?

古代杞国西周时初在雍丘(今河南杞县),后经迁徙,到过今天的滕州、新泰、昌乐,公元前544年迁到淳于(今安丘东北),是一个小国。一个弹丸小国,居然还有一个忧天的人,这倒是一件值得稀奇的事,平日里人们熟视无睹的天,竟然还有人担忧它会掉下来!

其实,杞人并非如古人以为的无生事忧,而是忧得实在有道理。因为今人也有如此这般忧天的,非要去搞清楚或者去探究,那个杞人到底为什么要忧天?经过实地调查,还真发现了问题。古

与高锴一席谈

有记者天真地说:如果他不^①去国外,我国就可以有诺贝尔奖得主了……



高锴

把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“高平子”。高锴父辈兄弟七人,个个精于儒学,也都通晓西方文化。父亲是老二,诗词好,在上海大同大学学英语。三叔在震旦大学攻读西方文学,早年留学美国,学法律。堂哥和大哥上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,学建筑,后来都从事教育,曾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行者。

今天高家影响最大者是三叔的儿子高锴。他1948年随父移居台湾,1949年又移居香港,进入圣若瑟书院就读。中学毕业后考入香港大学,再赴英国留学,1965年在伦敦大学所属的帝国理工学院获得电机工程博士学位。从1957年起,他就研究光纤纤维在通讯领域的运用,1964年,提出在电话网络中以光代替电流,以玻璃纤维代替导线。1965年,在实验基础上提出以石英基玻璃纤维进行长程信息传递,带来通讯的革命,并提出当玻璃纤维损耗率下降到20

分贝/公里时,光纤维通讯就会成功。1966年与何克汉共同提出光纤可以用作通信媒介。他在电磁波导、陶瓷科学方面有多项专利。1981年,第一个光纤系统成功问世。如今,超过十亿公里的光缆以闪电般的速度通过宽带互联网,为全球提供数据。高锴也因此获得了“光纤之父”的美誉,于2009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
高锴得奖后,一些报刊记者得知高锴是他的堂兄,兄弟之间感情很好,于是跑来采访。有记者天真地说:如果他不^②去国外,我国就可以有诺贝尔奖得主了。高锴对记者说:如果高锴留在国内,由于家庭出身,很可能连大学都上不了;有幸上了大学,在1958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很可能被“拔白旗”;如果有幸做科研工作,到了“文革”时肯定会被当成“修正主义苗子”批斗。总之,在极左路线下,如果他在国内将一事无成。

高锴的说法是实情,这可以从他的经历中得到旁证。他自己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。该校当年校风很好,毕业生里,两院院士出了几十个。1946年,高锴读高中时参加学生运动,成为中共地下党员。1949年,党组织决定让一批党员考大学,那时大学是各自招生,高锴报考四所大学都考上了。他原想上北京大学,组织上让他去教会大学,他便入读燕京新闻系。1951年初,组织决定抽调他去北京市工作。组织一声召唤,他根本不考虑学业是否从此中断,第二天就背上铺盖卷到北京市委报到,给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崔月犁当了机要秘书。

1955年肃反,高锴的父亲被捕,罪名有三:恶霸地

主,豢养地主武装,反对土改。高锴因此成为机关肃反的重点对象。批斗会上逼问:你家里有几个黑牢,搞过几个丫头?有多少枪?高锴无奈地回答,我家多的是书。初中三年级时和黄炎培通过信,也被说成是向中间势力靠拢,认定他思想复杂。支部要把他劝退出党,崔月犁支持他申诉,他才得到平反,但档案中还是留下了大量虚假材料。他看^③在机关待不住,于是要求做新闻工作,去了《北京日报》。1957年3月,中南海召开鸣放座谈会,报社派他去采访。《人民日报》报道称章乃器恶狠狠地提出二十年定息问题。高锴在场,认为报道不实,写了一封信说:“章乃器发言时我参加了,那天《人民日报》记者没有来,写的不是那么回事。”这使他大难临头,只好找崔月犁求助,崔月犁给周游总编辑、范瑾社长各打了一个电话,说:“高锴同志在我这几工作很多年了,人是很热情的,工作积极努力,但是政治水平低,思想糊涂。”把性质说成“人民内部”问题。周游对高锴说:“你怎么那么糊涂!”没有戴右派帽子,但定为严重右倾,说:你来这儿不到四个月,赶紧下放,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一旦被贴大字报,就难以挽回。社长范瑾说:“你还是好同志,但是思想太右了,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啊。”高锴以“戴罪之身”下放石景山区鲁谷村劳动。崔月犁到石景山区搞调查研究,特意到村的小屋里住了两天,村干部对他的态度才温和起来了,算是躲过了一劫。所以他试想:如果堂弟高锴不走,能更幸运么?

(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,著有《冬夜长考》等书)

杞人忧天有他的理由

很多看似不可能的或者被认为是荒唐的事情,如果真的以科学的态度对待,深入调查研究,就会真相大白。

小的陨石坑,多亏了嫦娥仙子非凡的能力,能够避开那些坑洼不平的地方,让我们的玉兔有一个施展自己行走功夫的舞台。想想当初撞击月球的那些大石头要是砸到杞国,杞国人惊恐之余,还不应该赶快挪挪地方吗?不怪别的,只怪那个忧天的杞国人没有说清楚他为什么要忧天。也不怪那些辛辛苦苦编写成语的人,他们可不知道杞国那地方的天上会掉下很多石头来,让杞国人忧心忡忡、茶饭不思呢!

很多看似不可能的或者被认为是荒唐的事情,如果真的以科学的态度对待,深入调查研究,就会真相大白。其实,无数原本会落到地球上的大小陨石,都被月球“代领”了,幸亏我们有月球这个不说话的卫兵,在几十亿年的时间里默默地替我们消受无数小行星不停地撞击,把自个儿的表面弄得这里一片阴影,那里一个黑洞。玉兔上去可不可能蹦蹦跳跳,而是要小心翼翼、瞻前顾后。当然,这也让我们的祖先想象出广寒宫和桂花树啊、嫦娥和吴刚啊等等浪漫而美妙的传说,当我们抬头看见它就会

生出很多的遐想。哎呀,这原本就是老天爷的安排嘛,谁叫我们的祖先想象力那么丰富,让我们把地上不能实现的梦想寄托在这么一个环境严酷、毫无生气的星球上呢。但是无论仙境还是梦想,现实是,很多小行星确实就在我们周边。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上空爆炸的陨石,造成一千多人受伤和巨大的财产损失,前不久天文学家们寄予厚望的彗星埃森,在近日点附近突然消失,变得无影无踪,让天文学家们一片茫然。这两件事充分说明,“忧”是因为有让人忧虑的事情。俗话说,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。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上,不仅自然环境造成很多不确定因素,人为造成的潜在隐患也常常暴露出它们的可怕,比如现在越来越频繁地笼罩我们的雾霾,还有极端天气的越来越极端,它们的影响和变化趋势都是未知的。因此,那些为人们有一个安宁幸福的生活而忧的人,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,在今天,其实是多么可敬啊!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、翻译家)

陈振濂先生在《书法学》中,曾按书法家与时代的认可度,将书法家分成三类——超前型、同步型和滞后型。如果按照这个标准,唐代书法大家柳公权显然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书法家代表。据简直先生《书从天来》的研究,柳公权的名气,在唐朝时是远远高于后来被奉为巨擘的颜真卿的。

那么,柳公权的书法名气到底有多大呢?唐朝民间有“柳字一字值千金”的说法,苏轼《书唐氏六家书后》中也有柳书“一字百金,非虚语也”的明文记载。《旧唐书·柳公权传》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柳公权书法的影响:

公权初学王书,遍阅近代书法,体势劲媚,自成一家。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,不得公权手书者,人以为不孝。外夷入贡,皆别署货贝,曰此购柳书。

还没听说过历史上有哪一位书法家名气

【书法茶座】

柳公权的书法名气

□杨加深

大到如此的程度。从国内看,当时的公卿大臣家里老人去世了,一定要请柳公权来书写碑文,如果碑文不是出自柳公权之手,周围的人就认为其子孙不孝,原因是舍不得出钱请柳公权写字。从国际上看,外国人来唐朝入贡,至少要准备两份礼物和钱,一份进贡给皇帝,另一份则用来购买柳公权的字。这才叫名副其实的享誉海内外啊!

值得一提的是,在唐代书法家中,享受国际声誉的并非只有柳公权一人,唐初的欧阳询也曾有过“高丽遣使购其书”的荣耀,然而也仅仅是高丽一国而已,与《柳公权传》中的“外夷”相比,影响范围之别不言而喻。

坦白地说,仅就书法水平而言,在唐朝的大书法家中,柳公权的水平至少应该在欧阳询、褚遂良、颜真卿之下。一生常伴君王侧的柳公权,与颜真卿相比较,不但生活、阅历上略显平淡,即使在书法风格上,也远没有颜书几乎每碑一种风格的变化。然而,以上三人,谁的名气也没有在当朝受到过如此高的尊崇。宋代以后,颜真卿成为书法的“广大教化主”而备受推重,而柳公权的书法则被米芾视为“丑怪恶札之祖”,自此,其书法地位距颜真卿等愈发渐行渐远。

那么,为何他能在当时有如此大的名气呢?我认为,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。

其一,柳公权是唐代最长寿,历任帝王最多的书法家。柳公权(778-865)享年88岁,自唐宪宗元和三年(808)入仕以来,历任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、懿宗七朝,而且在穆宗、敬宗、文宗三朝一直侍书禁中,并得到唐文宗“钟、王复生,无以加焉”的极高评价。仅就此一点而言,也是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颜真卿等人无法比拟的。我们且不说上述诸人的官阶如何,单就七朝老臣的地位而言,柳公权也已经成了“国宝”级的人物。我没有做过专门考察,但相信即使放在整个中国书法史的长河中,也应该没有第二个大书法家具备这样的资历。何况他官至太子少师,在唐朝可是二品大员啊。

任何事情都存在特殊性,但一般说来,艺术生命是与一个人的寿命成正比的。柳公权的长寿,无疑为他的书法生命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。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曾考察过柳公权四十余岁时写的《平西王碑》,并发出了如下感慨:“柳诚愚《平西王碑》学《伊阙石龕》而无其厚气,且体格未成,时柳公年已四十余,书乃如此,可知古之名家,亦不易就,后人或称此碑,则未解书道者也。”

其二,柳书适合刻碑。我们且不论米芾如何看不上柳公权的字,那是宋朝的事情。但在柳公权时代,他却是中晚唐与^④伦比的楷书大家。柳公权以楷书著称,与颜真卿齐名,合称“颜柳”;又因其书法以骨力劲健见长,后人将颜、柳之书风并称“颜筋柳骨”。当然,唐人的楷书都适合石碑,但晚唐人书法中之最适合石碑的,却非柳书莫属。

其三,柳公权是晚唐书法界之擎天一柱。柳公权之所以在当时名气最大,一个原因当然是当时前辈大家均已去世,柳公权成为当之无愧的中晚唐楷书领军人物。另一个原因是,柳公权在世时的情况也与前辈书家不同。如“初唐四大家”是一个书法高手群体,各领风骚,分庭抗礼;中唐时的颜真卿,也至少有张旭、怀素等巨擘;而晚唐的柳公权书法则成为当时的擎天一柱,再无堪与其比肩者。

其四,柳公权是历史记载中碑帖最多的书法家。尽管就大众而言,我们熟悉的柳公权作品只有《玄秘塔碑》、《神策军碑》、《蒙诏帖》等几件,但历史记载的柳公权碑帖却多达107种(其中包括被后人考察为伪作者十余件),这在唐代书法家中也是罕见的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副院长,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)